

[当代文学]

非理性主义与女性意识的熔铸： 论徐小斌小说中的女巫书写

李燕妮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40)

关键词 徐小斌小说 女巫书写 非理性主义 女性意识

摘 要 徐小斌的小说想象奇诡、巫风弥漫,对“女巫”的书写与塑造成为其创作的典型风格。徐小斌笔下的女巫既延续传统女巫的远古灵质,又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品格,并向菲勒斯中心体系下女性的宿命投来深情一瞥,凸显出强烈的女性自审意识。徐小斌的女巫书写以其神秘性与非理性实现对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的超越,并以女性写作的姿态突破男权叙事对女性身体写作与欲望言说的“封喉割舌”,生成自身魔幻反叛的女巫叙事风格,同时她还以巫的感性与超验叩问广漠的存在之维,生成女巫书写神秘灵动的诗性品格,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审美想象和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9)-157-08

DOI :10.13399/j.cnki.zgwxj.2019.04.022

The Cosling of Irrationalism and Female Consciousness : On the Writing of Witches in Xu Xiaobin's Fictions

LI Yann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Key words : Xu Xiaobin's fictions ; the writing of witches ; irrationalism ; female consciousness

Abstract : Xu Xiaobin's fictions are full of miraculous imagination and mysterious witchcraft, writing and shaping the image of witches has become the typical style of her fictions, these witches extend the spirit of the old witches, they also have the character of modernity and cast a deep glimpse to the fate of women under the patriarchal center, thus they showing a strong female self-examination consciousness. Xu Xiaobin's Witches' writing has transcended realism and rationalism with its mystery and irrationality, she writes her fictions in a way of female writing, and her fictions also broke the way of patriarchal narrative which prohibits female body writing and desire speech. In the meantime, Xu Xiaobin's fictions have created a narrative style of magic and rebellion, she inquires about the existence dimension with the sensibility and transcendence of witches. Also, she creates a poetic character of writing on mystery in aesthetics, which enriches the aesthetic imagina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徐小斌将神秘书写传统、非理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思潮,及自身纤细敏感的主体精神、细腻深刻的性别之思与伤筋动骨的存在之痛熔铸于小说创作中,使得小说巫风缭绕、魅影重重。但遗憾的是,学界对徐小斌其人其作的研究尚不充分,对其作品中挥之不去的“女巫气质”更缺乏系统的把握,而“女巫”作为渊源已久的历史身份与文学典型,多是一种人生境况的真实烛照与文学想象的真切实存。本文拟采用女性文学研究的立场,同时融贯人类学、民俗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对徐小斌笔下女巫形象的生成缘由、基本类型、独特性、现实讽喻意义、叙事学及美学价值等做系统的挖掘,以期建构起徐小斌小说魔幻反叛、神秘灵动的女巫风格,从而充盈当代文学的想象空间,促进当代文学的多维发展。

[收稿日期] 2019-03-10

[作者简介] 李燕妮,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巫之生成：借古讽今，超越理性

徐小斌的小说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她仍笔耕不辍，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间，她共著有七部长篇及五十余部中短篇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巫女”“巫术”“通灵”“耳语”“梦魇”“神谕”等字眼层出不穷，纵观其小说，可以发现徐小斌致力于塑造极具非理性特质、高度张扬女性意识的女巫形象，徐小斌笔下女巫形象的生成既得力于非理性思潮的影响，又离不开传统神秘书写的滋养、作家主体经验的浇灌及女性主义的涸染。

首先，非理性思潮对徐小斌笔下女巫形象的生成影响颇深。在《折梦》《生如夏花》《炼狱之门》等散文集中，徐小斌多次依据非理性思潮中的荣格原型学说挖掘原始意象在人精神层面的凸显，原型学说对人精神本体的肯定、隐秘内心的发掘及超自然心象的剖析，深刻启发了徐小斌的创作。在荣格看来，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潜能：“这种潜能以特殊形式的记忆表象，从原始时代一直传递给我们。”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就是原型，巫者原型是荣格识别和描述过的众多原型之一，他认为巫者原型：“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依据荣格学说，徐小斌笔下的女巫形象首先应从人类学上溯源，以追踪“女巫”作为原始意象在作家无意识层面的生发显现。人类学上的女巫是“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她们活跃于天地之间、沟通人神、招魂祭鬼，成为女性特殊身份的表征。历史上女巫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在母系氏族社会，巫师由女氏族长兼任，受人敬重、被尊为女神。自进入父系社会以来，女性下降到男性的从属地位，女巫却对抗了父系社会要求的“女不治事，女不言外”的审美传统，视男权规范于无物的女巫也由此成为父系社会贬斥、丑化的对象。李进超指出：“从当代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女巫文化就是典型的男权叙事，是对女性的丑恶化、妖魔化和欲望化。”徐小斌笔下的女巫延续着历史女巫的精神灵质及与男权的对抗性，而作家的创造性加工则使她们一改被男权叙事涂抹的丑陋形象，变得千姿百态。除荣格原型学说外，非理性思潮中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哲学亦对徐小斌笔下女巫形象的塑造产生影响。徐小斌曾以精神分析小说《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荣膺国际大奖，对精神分析的运用是其创作的一大特色，热衷于关注梦魇、先知、直觉、幻想、灵感等潜意识状态的精神分析学，无疑打开了徐小斌笔下女巫们心象世界的大门，使女巫能在梦魇与幻境中将虚拟与现世对接、在谶纬与巫音中预知人事的未来走向、在神谕与耳语中接受天灵的潜在指引、在心灵的朝圣与宗教的皈依中寻找灵魂的归处等。在《羽蛇》《敦煌遗梦》《别人》等小说中，徐小斌多次肯定萨特及海德格尔的思想，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借鉴使徐小斌笔下的女巫形象成为一面透视异化人性、理性弊端及荒诞生存的魔镜，存在主义哲学的引入使女巫在虚无与实存、此岸与彼岸、荒诞与理想、真实与幻境之间来回跨越，进而深化了女巫形象的现实讽喻意义及文化批判意味。

其次，徐小斌笔下女巫形象的生成亦离不开传统神秘书写的滋养、作家主体经验的浇灌及女性主义的涸染。徐小斌曾在访谈中表示，幼年时对《红楼梦》等书的痴迷过早的开启了自身灵性，古典文学中巫术玄想、殊方异物的书写，怨鬼幽魂、花妖狐媚的形象塑造涵养了她的灵性，使得浪漫主义与想象虚构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不二法门。内倾型的个性特质及缺失性的童年经验则使徐小斌在应对外界打击之时，习惯于向心中神祇寻求庇佑，她的创作也由此成为对神祇呼唤的回答，一种浓郁的神秘性贯穿在她创作的始终，这体现在其小说中，便是她致力于叩问女性逼仄幽暗的精神维度、窥探迷雾丛生的生活世界及神秘难测的宿命悲剧、塑造与神祇对话的女巫形象、建构小说离奇魔幻的文本内涵。在《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缪斯的困惑》等创作谈中，徐小斌高度肯定西蒙·波娃关于“女人是第二性”及安娜·里奇关于女性写作是“以血蘸墨”的观点，女性主义理论对徐小斌的创作亦有影响，但这并不是说其是一位狭义的女权主义者。与之相反，徐小斌从自身落寞疼痛的成长经验、婚姻困惑及性别感悟出发，深味阴阳大地上两性规则的失之偏颇，她将自觉的女性意识熔铸于女巫形象的塑造中，以私人化的欲望叙事和以血作墨的躯体修辞来探索女性在菲勒斯中心体系下的悲情宿命。正如其所言：“父权制强加给女性的被动品格由女性自身得以发展，女性的才华往往被描述为被男性‘注入’或者由男性‘塑造’，而不是来源于和女性缪斯的

感性交往。”父系社会长达数千年的文化浸淫赋予女性的被动品格难以在短期内被女性颠覆,披上女巫这层神秘外衣的女性得以摆脱日常的生活逻辑,借用巫术之力来抗争父权规约的历史遗存。由此而言,徐小斌正是借女巫形象的反叛性来求索存续千年的两性难题,以期构建起和睦完满的两性关系。

从原型入手考察,徐小斌笔下的女巫形象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巫”为职业的女性,她们以传统巫婆为原型,历史上的职业巫婆“可以同鬼神说话,上达民意,下传神旨,能预知吉凶祸福,能为人除灾去病,从事预言、占卜、祭祀和招魂、驱鬼等巫术活动。”《双鱼星座》中的巫婆与《天鹅》中的温情木都属此类。另一种是带有“巫性气质”的女性。这类女巫可分为三种:一是妖化的女巫,她们性格阴鸷孤僻、带有一定的邪恶或复仇因子。这种女巫的原型是遭受侵害而成巫的“妖巫”,《夷坚志·江南木客》中记载:“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褻鬼,其神怪甚诡异……尤喜淫,或为士大夫美男子……阳道壮伟,妇女遭之者,率厌苦不堪,羸悴无色,精神奄然。有转而为巫者,人指以为仙,谓逢忤而病者为仙病。”女子因遭受木客侵害,情绪与肉身上均出现创伤反应,无奈之下只能操持巫业,以此宣泄自身郁积的情感。《蜂后》中出现了一位由于外界侵害而成巫的女妖蜂后,她原本与世无争,养女被男性玩弄致死后,她心中的仇恨因子被激活,她以巫术毒杀男性。二是神化的女巫,这种女巫仁爱悲悯,同时也对生存之苦、人性之恶体悟颇深,极具神性光环。《蓝毗尼城》中的女巫是以地母为原型塑造的,地母被视作是执掌阴阳交合、万物化生的母神,蓝毗尼城是精神匮乏、拜金势利的病态都市的隐喻,地母式的女人对城内灰衣人醉生梦死的生活忧心忡忡,徐小斌意图借女人的地母气质来疗救沉沦堕落的都市人。三是日常生活中的现代巫女,她们才情不凡,在精神上延续着传统巫女的远古灵质,成为遗世独立的魅影,这种现代巫女以传统巫女、神女为原型:“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高唐神女是一位由瑶草幻化而来的巫女,她是爱与美的化身,在情感关系及交游访友中表现出自觉的主体性。徐小斌笔下的现代巫女亦极具女性主体意识,她们十分熟稔父权规约,对人性、物化时代及生存苦海体悟颇深,她们以不无戏谑的方式在烛照苦痛人生的同时,也解构了父权规约及当代文明。《羽蛇》中的羽有着与生俱来的“巫性”,她天赋异禀、纯粹本真,生来背负原罪,却又一生赎罪,一生与炎凉世道、冷漠人心抗争,然而恰如徐小斌所言“世界失去了它的灵魂,我失去了我的性”。在一个物欲膨胀、信仰滑坡、崇高不再的异化时代,远古羽蛇所象征的“舍生取义”的救世精神终究难以复萌,羽的结局亦难逃一死,而这精神殒灭的悲剧又该归咎于谁呢?原罪?宿命?抑或世道人心?三者都是,却谁也不是,因为每一位清醒的当代人都在这苦海中挣扎,渴望救赎、渴望超脱,却终究在无能为力中碌碌终生。

二、巫之特性:透视现实,入木三分

徐小斌跨越三十余年的创作均体现出魔幻诡谲的巫性,在她看来巫性即人的真实性,这种巫性的背后:“是悲哀,是对于整个人性、人生的悲哀。”^①巫的产生根源于人对天地之间神秘现象的困惑与对改造、利用自然过程中遭受自然侵害的无可奈何,巫师伴随着原始巫教出现,巫教“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②作为情感性的精神活动,巫教并不是蒙昧无知的代言词,一方面,它是现世苦痛的承担者,常以富于幻想的表现方式反观人世困局,又以张扬主体意志的抗争手段回应现世苦难,对现实具有反观与批判性。另一方面,巫教源于现实且高于现实,具有浓郁的寄托与超越性。它以玄妙幽微的神灵世界寄托民众避凶祈吉、除灾求福、超越苦痛的渴盼,在人世苦短无常的悲情底蕴上泼洒巫的浪漫与超脱,实现对悲情人生的审美超越。徐小斌将巫的反观与超越性引入女巫书写中,同时以现代性视域及女性主义视角观照女巫形象的塑造,使其在一片谶纬与巫音中反观当代工具理性及自然人性、精神坚守及利欲权谋、两性平等及父权规约等文化悖论。

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巫教反映出特定时代中,人在社会阶层、时政漩涡及天灾人祸等因素折磨之下的生存状况与情感依赖,巫师是巫教祭祀与巫术活动的从事者,带有鲜明的时代个性。徐小斌笔下的女巫是当代社会的产物,在讽喻世态的维度上,它是一面丰富立体的多棱镜,直观反映了当今时代

中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与人生况味的艰辛百态,具有强烈的现代性品格。李新宇指出:“现代性的根本标志是个人权利和工具理性。”^⑬工具理性作为衡量现代性的标尺之一,一方面极大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它又钳制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人禁锢为凡事只讲求规则定律的固步自封者。徐小斌的小说借“巫性”反观工具理性的弊端,体现出自觉的现代性意识。《缅甸玉》中的巫女阿韵单凭肉眼识别和用手抚摸的方式鉴别玉石,千万次的鉴定结果毫厘不爽,她甚至根据玉石的特性将独山玉仿制成白底青翡翠,进而骗过一切鉴别玉石的精密仪器。阿韵的巫性打破了工具理性中真与假的绝对标准,工具面前真假的判断有赖于数据,而一旦真品、赝品具备同样的数据,就会导致真假不辨,盲从理性契约将使人异化为工具的奴隶。《羽蛇》中,箫和亚丹将个人信息输入系统以求电脑红娘为其寻觅适婚对象,人的个性特征、情感爱好、精神特质等完全被抹除,鲜活的个体成为冰冷的代码,这无疑是机械化的生存模式对人情选择与价值判断的又一重遮蔽。个人权利是衡量现代性的另一标尺,李新宇指出现代性各个方面的核心即是:“个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⑭徐小斌的小说借“巫”的超越、批判性对自由人性、个体尊严及权利给予深切关注,从而凸显出强烈的现代性品格。任海燕指出:“现代的异化归根究底是自我异化,亦即人性的异化。”^⑮完满的人性本该立体多维、自由美好,而当代人却在膨胀的物欲中抛却理想、迷失信仰、消解崇高,成为耽于享乐的纵欲者、自私伪善的假面者与不择手段的算计者。徐小斌对当代社会中人性沉沦、价值失范的现象颇感忧惧,对完满人性的执着守望成为她笔下巫女孜孜以求的重任。《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的景焕对异化劳动的逃离,对个体自由的追寻。《羽蛇》中,羽为爱为情为信仰九死不悔的执着,与金乌、安小桃、韵儿等女性泯灭真情、放弃操守后游戏人生的精神无基感形成鲜明对比。《敦煌遗梦》中肖星星对潘素敏与大叶吉斯合谋害死无辜少年无晔以盗取文物行为的深恨等,都体现出徐小斌对美好人性复归的期盼。自由主义、理想主义、人本观念的高扬使新时期的小说彰显出典型的现代性气质,李定春、吴云认为1980年初的小说表现出清晰的个人观转型:“个人主体的诉求成为此期小说凸显的精神立场和价值观念。”^⑯诚然如此,自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创伤历史的反观、新型时代的审视与悸动灵魂的安抚,到乡土小说、寻根文学对精神原乡的守望、异化都市的逃离与本真人性的求索,再到新体验小说、新女性小说对琐屑庸常的物化生活的批判、个体生命经验的观省、女性精神原欲的彰显等,人性、人欲在此被提及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工具理性与物化时代也被推置于文学的解剖台,现代性尺度成为考量文学创作的标尺。徐小斌的小说是新时期女性小说的代表,她对人性、人欲的重视承袭了新时期的人本观,她将虚构的女巫形象置于现实环境中,求索当代人的完满人性。此外,她的女巫书写还涉及对工具理性弊端的反观与批判,带有警示理性契约的寓言式意义。

在新时期的女性小说中,徐小斌、林白、虹影等女作家总是对巫鬼文化青眼有加。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敏于直觉、长于情感的女性确与巫鬼文化本源亲近:“女人不接受逻辑理论和道德规范……在她的生活领域里,处处都有魔术产生,而在她生活范围之外,则一切都神秘不可测。”^⑰西蒙·波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女性相较于男性,在心象体验、思维逻辑及情感特质上,更为突出的神秘气质。这在新时期女性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徐小斌笔下诡谲多姿的巫女、巫风萦绕的异域,林白笔下鬼影飘忽的阁楼、在人妖间幻化的女子及虹影笔下游荡人间的怨鬼、蛊惑人心的玄术等,这种拟巫手段在女性小说中的运用,将当代女性充分展露的生命欲望、高度自审的主体精神及独立坚韧的女性意识以一种夸张化、陌生化的方式张扬得恰到好处。在新时期女性小说中,徐小斌以其深广的人文情怀及开阔的性别立场区别于其他女作家,她深入开掘当代女性的生命困境与精神图景,她的女巫书写体现出女性自审意识的深化,女性自审意识是指女性对自身的自然性属、社会地位、文化处境、灵欲挣扎等做出的自我观审。自五四时代的启蒙呼声以来,女性自审意识在庐隐、丁玲、凌叔华等女作家的小说中就多有体现,但此时的女作家仅以微薄之力撩开女性秀苑深闺的一角帷帐,开始审视女性生命欲望的枯竭、自然人性的压抑与精神荒原的苍白。新时期以来,女性自审意识向纵深发展,作为新时期女性小说的代表,徐小斌笔下的女性自审意识呈全面深化的趋势,这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徐小斌笔下的巫女以匹马当先的苦痛经历烛照出女性边缘逼仄的生存空间。通过对《双鱼星座》中卜零被老板设计除名,受尽刁难的情况的刻画,可以看出体力

上的弱势本就是女性求职的短板,而社会强加给女性的被动文化品格诸如妊娠、育儿、顾家等又使得用人单位戴上了新的有色眼镜考察女性,女性也由此多处于职业空间中被挑剔者、被淘汰者的尴尬位置上。通过对《蜂后》中丽冬被男性玩弄、错失名节与性命,《羽蛇》中亚丹未婚生下羊羊,并终生牵念早已出国成家的初恋男友,将其视作自己的精神支柱等情节的刻画,可以看出菲勒斯中心体系下,女性情感空间的属一化与落寞化,女性主义者维思娜·科斯认为,入侵者强行对“它者”领土的“进入”可以理解作为一种“阳具”霸权行为。男性性爱的本质是在发泄生理欲望的同时满足自身占有、征服、操控、掠夺等权力欲,这就决定了若无坚定的责任感及稳固的婚姻关系为依据,男性很难长久钟情于某位女性。而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多扮演的是接纳与驯服者的角色,积习已久的贞洁观及流血、妊娠的风险使女性不会轻易向男性交付身心,一旦成婚,她们更易定心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在徐小斌笔下,由于两性性属的本质不同及文化规约的内在约束,女性更易成为畸形婚恋的受害者,也更具迷惘落寞的情感空间。其二,徐小斌笔下巫女的自审意识切近时代脉搏,反观出“剩女现象”“单亲母子现象”等困扰女性生活的历史新题。首先,历史遗存的父权规约、女性稍纵即逝的青春、女性渐趋独立的经济地位及女性理想化爱情观所催生出的“剩女现象”在其笔下数见不鲜。《迷幻花园》中芬和怡以生命与灵魂为代价换取青春美貌的闹剧,昭示出夫权选择“不许美人见白头”的苍凉现实。在时代的进步浪潮下,女性步出闺阁,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一展芳姿,但父系社会中通行千年的清规戒律“女人的世界就是她的家庭:丈夫、孩子和家”^⑧,以及内心深处对爱与圆满的渴求又使女性首鼠两端,在挣扎惶惑的情爱迷城中竭力找寻青春、事业与家庭的平衡点。此外,当代社会中享乐主义、自由恋爱观、物质主义等的盛行,使人的责任意识趋于淡薄,道德律令不再是人人奉守的圭臬,家庭关系也不再是牢不可破的金汤,离婚率的持续走高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显相。徐小斌笔下的巫女多以伤筋动骨的婚恋之痛,折射出当代社会中千千万万单亲母子家庭缺少温情、问题频出的生存现状。《炼狱之花》中,天仙子捉襟见肘、辛酸孤寂的处境表明单亲母亲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与情感重荷,而女儿曼陀罗对她的冷嘲热讽又反映出单亲小孩冷漠畸形的缺失型人格。不同于同时期陈染、林白、虹影等作家借拟巫手段刻画女性玄虚迷惘的心象世界、封闭自恋的精神空间,徐小斌的拟巫小说侧重于对当代女性社会生活中实际困境的揭露、对历史遗存的父权规约的鞭挞,从而使小说生出极强的现实意义与切近时代脉搏的精神品格。此外,与卫慧、棉棉作家等的“另类女性小说”所体现出的盲目仇视男性、极力解构婚姻制度、消解正常两性关系不同的是,徐小斌的小说虽着眼于女性视角,却体现出一种深广的超性别意识,它求索的始终是一条两性和睦共生之路。

三、巫之价值 精神在场 魔幻灵动

文学中的“倡鬼近巫”现象由来已久,鲁迅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⑨在某种程度上,徐小斌的女巫书写可以被视作是巫鬼传统在当代文学中的延伸和变体,亦是西学思潮浇灌而出的文坛奇葩,它汲取寻根文学取法拉美、重返民俗的创作经验,沾染先锋文学反叛传统、崇尚革新的自由精神,同时进一步张扬当代女性写作的自觉、自恋与自审意识。可以说,徐小斌的女巫书写以其非理性与神秘性实现了对传统小说中现实主义、理性主义的放逐与超越,并以女性写作的姿态突破男权叙事对女性身体写作与欲望言说的“封喉割舌”,生成魔幻反叛的女巫叙事风格,同时徐小斌还以巫的感性与超验叩问广漠的存在之维,以“精神在场”的方式探寻无限的形上空间,生成女巫书写在美学上神秘灵动的诗性品格。这种拟巫手段的运用,使小说在神秘氛围中生发出悠远丰富的创作题旨,同时陌生化的创作手段对现实题材的加工与变形,深化了小说对现实的开掘与讽喻深度,以一种魔幻生动的言说方式对社会症候、人性劣根、文化顽疾等现实弊病进行刨根究底的揭露,从而达到入木三分的表现效果。此外,拟巫手段的运用,以新颖神妙的写作思维与修辞技巧创新文学的表达形式,话语迷宫、时间断层、叙述空白、死亡书写、梦境叙事、宗教言说、宿命主题等书写形式的引入不仅给读者带来陌生新奇的阅读体验,还深化了读者的审美愉悦之情。

从叙事学上分析,徐小斌女巫书写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四点:一是徐小斌将巫语引入女巫书写中,利用巫语的陌生性、先验性与混沌性打破日常语言逻辑的禁锢,生成非逻辑性的叙事语言。从民俗学上来看,巫语“几乎或根本没什么含义,甚至说这些话的人也不解其意。”^⑩在徐小斌笔下,巫语只是女巫借此实现预言、问神、算命等特殊目的的工具,巫语的引入加重了文本的内围感、神秘感和命运感。《双鱼星座》中的巫婆根据卜零一句不知所云的“刺青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杀菌药”^⑪,卜算出卜零被男权文化倾轧碾碎的爱欲本能;此外,徐小斌还采用近似巫语的陌生化、反常化的叙事语言,这些语言混沌难解且新奇多趣,是点缀文本魔幻内蕴的神来之笔。《羽蛇》中对羽的描绘:“那些毒鱼的眼睛在羽的眼睛背后生了根,能够洞穿一切。”^⑫这种反常化的叙事语言将羽孤僻反叛、敏感通灵的个性展露无遗。二是徐小斌的女巫书写利用巫性思维的幻想性、非理性与直觉性,将过去、现在与未来三重时态之间的界限彻底打破,颠覆原有的时间观念,生成非线性的叙事时间。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连贯、匀速、不可逆转的线性叙事时间不同,徐小斌的女巫书写淡化了时间的现实真实性,以女巫迷案的心象体验为准,强化时间的心理真实性,使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重时态或环绕并行、或缺失断裂,从而使小说的叙事时间呈现出错综纷乱、朦胧神秘的独特美感。《蓝毗尼城》中,佛国圣地蓝毗尼城早在公元三百年之前就已消失,而活在当代的“我”却因飞机坠毁来到蓝毗尼城,并在城内遭遇种种劫难,其后“我”又返回到生活世界。小说隐去了“我”在现实世界与蓝毗尼城之间穿梭的时间和过程,使得蓝毗尼城宛若一座存在于时间荒崖上的孤岛,可望却不可及。这种迷离的叙事时间一方面将小说情节与小说事件消解得暧昧不明,另一方面却深入到人物的灵魂世界中去,凸显出了在纸醉金迷的蓝毗尼城内,人生存体验的荒诞、虚无感。三是徐小斌的女巫叙事将幻觉、梦魇、回忆、冥想、预感、现实等交错杂糅在一起,放弃中规中矩的连贯叙事模式,模糊化处理小说情节,生成非连贯性的叙事结构,从而使小说在情节结构的空缺留白中体现出亦真亦幻、虚实交错之感。《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景焕看破伪善人心,绝望出走之后,到底魂归何处?《羽蛇》中的羽到底是如何在早已逝世六十年的法严大师手下文身?又是如何在多次就死之后重获新生?这种叙事结构的空缺留白不仅加重了文本的神秘感,更使小说题旨言人人殊,它能极大地调动读者对缺失结构进行再创式想象的积极性,使读者在自主建构小说内涵的过程中体会到小说题旨的悠远、丰富与多重性。四是破除男权叙事对女性身体写作与欲望言说的“封喉割舌”,在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同时,也探寻出一套血泪歌吟式的女性身体与欲望的言说方式。在男权叙事中,女性总是以“天使和女妖”^⑬两种极端化的类型登场,天使型的女性清贞柔顺、持家孝亲,女妖型的女性红颜祸水、淫邪放浪,天使和女妖都是男性对女性极端化、扁平化、虚假化的想象,女性的真实欲望被遮蔽,女性身体成为被男性占有的客体。徐小斌笔下的现代巫女是批判和瓦解男权机制的形象范式,这些带有异质力量的巫女以决绝的反叛姿态扯下男权家礼的遮羞布,将女性真实的性意识、性渴求、性感受、性经验重置台前,如《双鱼星座》中卜零释放本能爱欲的自慰与《羽蛇》中羽和金乌忘情的同性欢爱等,女性的自慰与同性之爱都是对两性关系中男性一维的阉割与抹除,女性不再是被男性洞穿的客体,而成为真正的欲望主体。福柯认为身体以其生命力与感性成为对抗理性与规范的工具,女性的身体亦是女性对抗男权、争取自身权利的武器,徐小斌通过巫女的身体发声,批判偏激霸道的男权叙事,使女性的身体不再被男性戏谑和赏玩,深刻地展现了女性的情欲挣扎与自我救赎。

徐小斌还将神秘主义、存在哲学、宗教意识等引入女巫书写中,使得女巫具备连通三界、破除生死、真幻相生的诗性气质,这并不是说她们玄虚荒诞,与之相反,她们得以超越有限的经验世界,探寻无限的形上空间。徐小斌经由先锋反叛的女巫塑造之途,解构了权威话语系统中的“生活真实”与“理性必然”,颠覆原有的审美认知,以一种神秘、感性、超验的“巫的真实”无限逼近哲学维度的“存在与精神的真实”,从而生成女巫书写在美学上神秘灵动的诗性品格。这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超越此在的沉重肉身,舒缓灵魂困守大地的焦灼。倾轧的人性、异化的劳动、技术化的生存方式与虚无化的生存体验在为当代人带来利益财富的同时,也使得人的精神世界一地鸡毛,女巫却并未在琐屑庸常的苦痛生活中苟活迁就,她们借巫的神秘与超验力量实现救赎的希冀、寻找灵魂的诗意栖居之所。首先,在女巫书写中徐小斌多

次引入梦境,从精神分析学来看,梦是人精神现象的一种,是人压抑已久的本能欲望在潜意识层面的凸显与释放。《双鱼星座》中卜零在梦中巧设连环计,完成对卑劣丈夫、虚伪老板及猥琐情人的复仇;《羽蛇》中的羽多次在幻梦中回归澄澈的蓝湖与温暖的巨蚌,并以此抚慰自己寻爱不得、落寞凄凉的内心等。女巫的幻梦是女性精神情感在潜意识层面的延伸,梦的生发根源于女性真实的生活处境,它是女性生活之苦、内心之忧与精神之痛的宣泄端口。其次,徐小斌将宗教意识、信仰皈依、终极关怀等引入女巫书写中,《敦煌遗梦》中的肖星星为摆脱千疮百孔的生活来到敦煌,在敦煌之梦破灭于阴谋与血腥中后,她又远走印度,寻找心中的佛国圣地;《羽蛇》中的羽为赎罪前往西覃山金阙寺,以“血税”的方式洗涤今生的原罪;《双鱼星座》中的卜零和《缅甸玉》中的徐小姐为找寻质朴人性、体验原始风情来到遥远异域,在这里她们实现了自身的文化寻根与精神还乡。女巫的朝圣之旅、赎罪之途及寻根之路都是对现世苦痛的承担,这种承担带有浓郁的超越意味,她们将沉重的肉身从现世的生存困境中抽离,凭借宗教、信仰与精神原乡的力量引渡无望的生存苦海、眺望诗意的彼岸天国,在温暖人伦的重建、本真人性的重拾与澄明之境的重构中寻求人生的终极关怀。二是探寻超验的死亡之谜,挖掘死亡现象背后的深义。叔本华将死亡的困扰视作哲学的源头,死亡虽是人生命现象的一种,但并不能被经验感知,它带有绝对的超验色彩,它也并非无意义,海德格尔认为死亡“作为其本身则是不确定的、超不过的可能性”^①。人生在世,有生必有死,生死交替才有了人世的生生不息,对死的叩问实际上是对生的另一重关切。死与巫都以超验、神秘和偶然性超越于人的理性认知之上,死亡之谜的探寻与女巫形象的塑造同根同源,两者共同叩问广漠的存在之维。《羽蛇》中的羽历经八死却不死,最后被摘除脑胚叶的她彻底死去,徐小斌无意揭开羽肉身死亡的真相,她更关切的是羽的精神之死,因为精神之死意味着羽的质朴人性、天赋才情和精神坚守在沆瀣尘世前全盘覆没,羽的死谱写的是一阙人性的祭曲。《天鹅》中温倩木对夏宁远之死的开释带有佛性,星云大师指出佛教应以一剂欢喜来医治人世的万般苦楚^②,温倩木将夏宁远的死形容为天地间物质的转化,这种转化是带着“大欢喜”的重生,徐小斌借女巫之口为死亡提供了颇具佛家开悟意味的阐释,这种阐释关注的并非是死者,而是旨在为生者提供精神宽慰。三是窥探神秘难测的宿命悲剧,展现主体不屈的抗争精神。传统哲学历来讲求宿命一说,李泽厚指出:“‘命者也,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即人力所不能控制、难以预测的某种外在力量、前景、遭遇或结果。”^③宿命带有浓郁的未知色彩,它最为神秘之处在于偶然中包孕必然,穷达富贵、祸福毁誉、死生存亡都听凭命运之轮的安排,而宿命悲剧则是人生无常性的隐喻,是生存之苦的又一重体现。徐小斌笔下的女巫对无常宿命有着深刻体悟,如《敦煌遗梦》中肖星星从猩红色的梦境中预知无咩将惨死敦煌,为此她竭尽全力保护无咩,尽管最后宿命悲剧依然应验,但肖星星对宿命的抗争姿态依然让人动容。超验的灵性赋予女巫感知命运的能力,她们在强大的宿命悲剧面前并非不作为,恰如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明知结果不乐观,却依然尽己所能去抗争,从而如浴火重生的凤凰一般,在不屈的抗争中张扬主体璀璨的精神之光。

五、余 论

徐小斌笔下的女巫形象已不再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化身份或文学形象,这些女巫将救赎的热情投注于当代人真实的人生境况中,成为一份对人的生存关切与精神烛照。此外,徐小斌的女巫书写意义深远,它引导文学颠覆传统现实主义的教条、突破理性写作的窠臼,使文学在瑰丽的想象王国中飞升驰骋,在多维的文化殿堂中博采众长。当然,徐小斌的小说创作也有弊端,这一来表现为女巫之外的男性一维整体上较为疲弱,这在一定程度上略显局限;二来表现为女巫多以想象或虚构的方式寻求终极关怀,而这寻求的结果无疑又将复归想象与虚构。索非索,欲索何索,究竟何处才是当代人的精神原乡与灵魂净土?这恐怕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注 释:

① (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20页,第120页。

- ③臧克和、王平校订《说文解字新订》,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04页。
- ④宋兆麟《巫与巫术》,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0-32页。
- ⑤李进超《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中世纪女巫文化》,《社科纵横》2016年第9期。
- ⑥徐小斌《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6期。
- ⑦宋兆麟《巫与祭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96页。
- ⑧(南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95-696页。
- ⑨(战国)宋玉著,吴广平编注《宋玉集》,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50页。
- ⑩⑫徐小斌《羽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第60页。
- ⑪徐小斌《遇难航程中的飨宴》,《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1期。
- ⑫(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3页。
- ⑬⑭李新宇《关于现代性的几点常识》,《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3期。
- ⑮任海燕《〈疾病翻译者〉:文化边界上的异化和失常欲望》,《湖南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2期。
- ⑯李定春、吴云《个人观转型对1980年代初期小说的影响》,《湖南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3期。
- ⑰(法)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05页。
- ⑱(France)Virginia Woolf. Three Guinea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66 p.111.
- 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 ⑳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下卷》,金泽、宋立道、徐大建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725页。
- ㉑徐小斌《徐小斌作品精选·女性文学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03页。
- ㉒(America)Sandra M.Gilbert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㉓(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310页。
- ㉔星云大师《在世与入世之间·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9-331页。
- ㉕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35页。

(责任编辑 周仁政)